

大国崛起



把握中国
四大王朝 **的**
历史脉象



DAGUO JUEQI
BAWO ZHONGGUO
SIDA WANGCHAO DE
LISHI MAIXIANG

晋璧东
郭晓斐
编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013067661

K209
248

大国崛起

把握中国
四大王朝 **的**
历史脉象

DAGUO JUEQI

BAWO ZHONGGUO
SIDA WANGCHAO DE
LISHI MAIXIANG

晋璧东
郭晓斐
编著



北航

C1675491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k209
248

1887308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国崛起:把脉中国四大王朝的历史脉象 / 晋璧东
郭晓斐编著.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3
ISBN 978-7-5336-7575-2

I. ①大… II. ①晋…②郭… III. ①中国历史—汉代—通俗读物
②中国历史—唐代—通俗读物③中国历史—元代—通俗读物④中国
历史—清代—通俗读物 IV. ①K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31640 号

书名:大国崛起:把脉中国四大王朝的历史脉象

作者:晋璧东 郭晓斐

出版人:郑可

责任编辑:王竞芬

责任印制:何惠菊

装帧设计:许海波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教育出版社 <http://www.ahep.com.cn>

(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 邮编:230601)

营销部电话:(0551)63683008, 63683011, 63683015

排版: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合肥创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0551)64456946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24.5

字数:350 千字

版次: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36-7575-2

定价:41.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大国崛起

目录

淡泊浮沉荣辱的炎黄性格——大汉雄魂

大汉历史年表	005
大汉简史	003
大汉版图	002

历史前论	005
开国气象:汉兴楚亡,承周开泰	012
国策政治:皇权隐忍,待机攻取	016
权力品格:封邦建国,皇权中枢	020
吏治风格:初始共服刘汉,中后离经叛道	026
民族宗教:和战四夷,佛入中华	032
经济力量:强弱盛衰,贫富失衡	038
军事张力:隐攻张弛,国之柱石	042
外交战略:上和下兵,攻守有度	053
文化景象:文史通览,精彩纷呈	060
社会图景:天人相合,求索、朴实、和睦	070
历史后论	080
大汉“善政八能力”简评	0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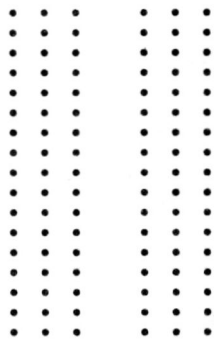
大唐历史年表	· · · · ·	大唐简史	· · · · ·	大唐版图	· · · · ·
092	· · · · ·	091	· · · · ·	090	· · · · ·

历史前论	093
开国气象：晋阳起兵，结束隋政荒唐	99
国策政治：政治之流，由清而浊	103
权力品格：君难恒正，臣难久忠	112
吏治风格：德训为先，辅以刑治	124
民族宗教：华胡和睦，引教入政	131
经济力量：市坊酒肆，都市繁华	143
军事张力：盛唐兵强马壮，晚唐铁马哀鸣	154
外交战略：隐忍和善，藏锋敛芒	165
文化景象：盛唐大国，文化尊荣	176
社会图景：四方胡夷，皆入中华格局中	189
历史后论	197
大唐“善政八能力”简评	203



淡泊浮沉荣辱的炎黄性格

—— 大汉雄魂



大汉王朝开启了汉民族的历史,由于有了大汉,终于孕育出人类史上族群最为旺盛的民族“汉族”,显然这个民族的骨血里沉淀着这个古老王朝的独特精神——淡泊荣辱,惯看浮沉;在往古来今的历史风云里青梅煮酒,羽扇纶巾。大汉王朝孕育了汉民族,给予了她肉体和精神。

王朝虽早已没落,现实的境遇里已无往日王朝的鲜活面容,但在古书青史中她却依然是鲜活生动的。所有的历史相对于后人来说都是无形而



莫测的，但文明的记载却使她永远是立体丰满的。古老的王朝并非是一具干尸，文字与故事使她具有不死的生命。

回首汉朝前后五百年，汉初黄老之学的休养生息、武帝的恢宏用兵，已然将中国政治史中的文武之道、隐忍攻取之术表现得淋漓尽致。她在面临内外困境时的那种临危不惧、待机而为，看淡一时的荣辱浮沉，而谋求万世的豪华盛世的王者大智，确是其给予后来中华儿女的驭政国策，甚至融入日常的为人处世之中。历史的经验证明：在寻求强国之道时，必须懂得审势而为——恪守“韬光养晦”既为大丈夫之智，也是治国的绝学。

读完东西两汉相连的历史卷册，我们会发觉原来大汉帝国是中国寿命最长的封建王朝。其国家战略中的文武之道、隐忍攻取，使得她与前朝相比，争得了长久生存的机会。秦亡汉兴的历史说明：刚柔有度的王朝，才是历史的宠儿——过刚则易折，过柔则难立。因此，如今寻求强国、强族、强己之道的人们，必须熟谙此理。今日重读汉史，往日大汉的淡泊荣辱、惯看浮沉的大族情怀，依然历历在目——时间虽然久远，而历史却依然是鲜活的。

大汉版图

大汉的历史有着完整的从大到小、由弱至强的过程，其版图随着国力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同时西汉、莽新、东汉三个历史时代合二为一的事实，也在总体上影响着大汉的王朝版图变迁史。西汉初年，由于其国力微弱，加上西南有羌、西北有分治的西域诸国、北有匈奴、东北有东胡等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存在，其统治的中心是以长安为主的关中之地。

时经文帝、景帝，到汉武大帝之时，随着十余年的大战，汉军北出燕然山、狼居胥山（今乌兰巴托）、贝加尔湖（汉人叫做北海，苏武牧羊守节的地方），西边进击到葱岭、塔里木河、阿拉木图一带，四击匈奴。这次反击，彻底巩固了阴山草原等匈奴游击区，向北推进到沙漠边缘，而且占领了全部河西走廊与西域地区（青海、新疆部分地区），设立了西域都护府。同时东

北拓展到朝鲜半岛中部,西南拓展到云南和四川地区,以及海南岛北部。著名的丝绸之路就是这个时候开通的——大汉的生存空间第一次得到大规模伸展。

随着西汉的衰落,莽新之乱,北方的匈奴南侵,大汉的版图曾一度萎缩,如河套、陕北、晋西北、河北北部等地区先后被迫放弃。但时至东汉重振,朝廷启用窦氏出击匈奴,使得国家部分版图得到适当的复扩。东汉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汉军进攻北匈奴,打通了与西域的交通线,又派班超控制了鄯善(今新疆若羌县一带)、于阗(今新疆和田市、和田县一带)等国,于是在次年重新设立西域都护府,收复了这一大片疆域。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西域都护府撤销。由于汉朝的撤退使西域各国再次受到匈奴的威胁,一些国家重新寻求汉朝的庇护,促使汉朝在延光二年(公元123年)设置西域长史府,继续行使对西域的管辖。但此时,乌孙已成为独立政权,葱岭(帕米尔高原)以西地区也脱离了汉朝的统治,汉朝的西北边界退到了今天山山脉西段以南。同时东北部随着高丽的崛起,版图萎缩;另外林邑国的扩张,使东汉疆域的南端也从今越南富安省南界退至承天省南界。总体而言,东汉势力范围不如西汉。

大汉简史

经历四年的楚汉战争,刚愎自用的西楚霸王项羽在四面楚歌中含泪别虞姬,自刎乌江。而他的对手汉王刘邦则在公元前207年定都长安,由此开始了史至公元8年的西汉王朝(西汉朝历经高皇帝刘邦、孝惠皇帝刘盈、刘恭、刘弘、太宗孝文皇帝刘恒、孝景皇帝刘启、世宗孝武皇帝刘彻、孝昭皇帝刘弗陵、刘贺、中宗孝宣皇帝刘询等帝王)。汉初由于多年战乱,国力衰微,因此汉初高祖、文帝、景帝三朝均采用休养生息之策来治国安民,兴起文景之治;在对外方面,以和亲之策来安抚屡次犯汉的北方匈奴。

时至武帝之时,多年的忍辱负重,大汉国力急剧膨胀,其以武力扫荡匈



奴,设置西域都护府,控制了西北地区,确保了大汉的安全。此时,在国内政策上,武帝借鉴景帝时采纳晁错“削藩”的建议引起七国之乱的历史教训,代之以柔和的文治形式推行“推恩令”,削弱了地方王侯势力,巩固了中央政权。同时在政治思想上,采用董仲舒创立的新儒学,容纳百家之长,一统百官臣民的思想。大兴太学,以儒家经典为教材,由此选拔官吏,如此而逐步强化了大汉王朝的思想一律,进一步巩固了刘姓国器。

或许骄兵必败,盛极而衰吧,汉武帝之后的王权继承者均懦弱而无志,沉湎于强国的美梦之中,醉生梦死。君昏臣强、弱干强枝,汉末的帝王如同重臣手中的政治玩物;外戚与宦官等角色,不断出现在汉末的政治舞台上。如此局面,有志之士不禁胸中燃起明君领政的欲望之火,当环视刘姓皇室皆衰弱无能的现实之后,他们终于将强汉的希望或赌注,押在了大汉重臣王莽的身上,终于将王莽逼入政治的巅峰,也是绝路。于是西汉末年,外戚王莽以“国公”执政,再至公元8年,废除傀儡刘姓皇帝,自己称帝,国号新。此时,已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刘姓政权至此暂时熄灭。

也许是天佑刘家,或是生活在两百多年刘汉政治历史下的心理作祟,人们似乎又认为:能够继承天意,一统天下的唯有刘家皇室,唯刘才为正统。于是,天人感应,天之异象不断,加上豪强干政、社会矛盾激化、天灾人祸,终于酿成绿林赤眉之乱,随之而来豪强起兵,王莽终在支撑仅17年之后,被刘姓子孙取而代之,国政又一次回到“刘家”之手。

公元25年,刘秀(光武帝)即位,同年定都洛阳,史称东汉。接着陆续击败各地的割据政权和敌对势力,至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一统天下。东汉王朝历更始帝、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殇帝、安帝、北乡侯、顺帝、冲帝、质帝、恒帝、灵帝、献帝共计十四个皇帝。但从此时刘姓帝王的政治素养来看,除了初始的光武中兴之外,其后来者均孱弱无能或年幼无知,重臣驭控皇权的形势远远甚于前朝。由于帝王年幼、外戚坐大,使中央式微的现实局面终于在“合久必分”的历史推动之下步入到“三分汉室”的吴、蜀、

魏对峙纷争的三国战乱时期。刘姓作为创立中国封建王朝中第一个强大持久的大汉王朝的国姓，终在经历近 500 年的历史浮沉之后没落，断绝了一统中原、问鼎江山的帝王气运。

大汉历史年表

大汉从刘邦建政到三国纷争，享国近 500 年。回顾这 500 年历史风云中的关键历史事件，则可以使我们准确地掌握大汉的生命运动线索，由此在生死浮沉的周期变化中理解大汉生命历程中的特殊历史拐点，以把握概貌，一览全景：

公元前 206—202 年，楚汉战争——公元前 202 年，刘邦立汉——公元前 200 年，平城之战——公元前 2 世纪，佛教入中原——公元前 180 年，诸吕之乱——公元前 154 年，七国之乱——公元前 138、119 年，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公元前 133 年，武帝大战匈奴——公元前 33 年，昭君出塞——公元 8 年，王莽废汉立新——公元 17、18 年，绿林、赤眉起义爆发——公元 23 年，绿林军诸将拥立刘玄为帝，恢复汉朝，同年攻入长安，王莽被杀，新朝灭亡——公元 25 年，刘秀（光武帝）即位，同年定都洛阳，史称东汉——公元 73 年，班超出使西域——公元 90 年，窦门虎将大战北匈奴；北匈奴自此流落欧洲——公元 104 年，司马迁的《史记》问世——公元 105 年，蔡伦发明新造纸术——公元 117、132 年，张衡发明浑天仪、地动仪——公元 184 年，张角发动黄巾起义——公元 200 年，官渡之战——公元 208 年，赤壁之战；自此不久曹丕、孙策、刘备相继称帝，历史进入三国时期，大汉灭亡。

历史前论

大汉王朝立世 500 年，其兴衰的历史全程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强势王朝的兴起原由、败亡之因，从而使后世的读史者或治国理政者，能够在把握兴衰的规律中正确地判断形势、认清国情，进而科学厘定内外国策，以在适应



国势的无为或有为的政治举动中,开启强健王朝脉搏的大国兴起之门。回顾大汉的由弱至强的崛起历史过程,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一种淡泊浮沉荣辱、惯看得失祸福的炎黄性格——依国力而定国政;适时藏锋敛芒、待机而动而终成羽翼丰满的猎鹰——于是开创起北战匈奴、西辟帝疆、南控蛮荒的大汉版图与大汉尊严。如今思考大汉的强盛之道,领略其强国雄魂,对于今日寻求强国之道的人们,其历史经验依然鲜活有用。

1. 尊奉黄老, 止战行仁 大汉初年,由于时自公元前 209 年的陈胜、吴广起义,加上随后紧接着长达 5 年的刘项“楚汉之争”,从淮河流域至黄河流域,无论是盛世大秦的国都咸阳还是自古富庶文明的中原,均处于兵火战乱之中——生民逃脱,田野荒芜,人畜残存,一片凄凉乱世的景象。史书记载:高祖年间,皇帝的御用马匹竟然全国难以寻找到两匹“同色之马”,三公九卿也只得以乘“牛车”而行公务。由此可见当时的民生凋敝。面对这种极端穷困,可谓一穷二白的现实经济状况,西汉王朝审时度势地制定了“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政策,一改大秦的重刑思想,大行“黄老之政”,并经文景两朝的国策承继,从而增强了国力、稳定了汉室江山。大汉这种清醒面对现实国情,初立国而行仁政的治国安民之策,几乎成为中国历代开国之君统统务实借鉴的驭国方略,为各自的王朝兴起奠定初始的政策基调,以复战乱后的民心与元气。

2. 文明奠定, 汉化成形 刘邦立汉,后世先后承传 500 年,在不断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汉室濡化,逐步形成了独具大汉王朝特色的历史风尚。大汉既继承了自成周源起,并经春秋孔孟播传的王权礼制,也扶正了由董仲舒所立而容纳百家(主要为道、法两家)的新儒学,在政治制度与社会道德文明的一脉相承中,逐步使儒家政治定为正统,从而中华政治文明自汉制起即有了灵魂。

除了政治思想上的开启新元,其历经 500 年的历史变迁,必然会影响到生活于刘汉王权下的臣民的政治观、社会观,以及对于族群的认知心理。

于是,以共同生活 500 年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及语言文字为基础,最终构建起了统一的初步的共同民族心理,至此原本名为“华夏族”的人群,最终在大汉王朝期间定名为汉族,成为中华民族人丁最兴旺的大族,也成为后来人类史中最大的族群。

汉制国风、民族生成,以及长期立处关中的政治经济事实,开创了中华民族史中永远不绝的汉制观、中原观、正统观。由此,中华民族在此时已初步完成观念塑造、制度确定、文明定型,大汉为“汉文明史”及中华文明史的历史关键点。这种汉家文明,对于今日求索重振国风与民族崛起的人们而言,依然不可或缺,必须明确:我们的崛起必须是充满民族文明特色的崛起,必须是在民族文化的根脉上的复兴。失去民族文明的所谓崛起,只能走向歧途。

3. 封邦建国,完善行政 封建制度源起于成周王朝,以求通过对国土的依据血缘、军功的封赏,给予受封人以丰厚的物质利益及辖区权力,从而意图达到维护中央王权,建立起荣辱与共的稳固的政治体系。但或许人性都是贪婪而自私的,尤其是长期尽享分封特权的王侯公族,一旦王室衰微,他们就会在王权的巨大利益的诱惑下,以所谓安定天下、结束无德暴政、清除朝中乱臣贼子为名,而大行武力争夺,直接威胁到中央王权。

鉴于此,当历史进入春秋战国之际,力图一统周室衰微局面的西秦即在尊崇法家治国思想的重臣商鞅的主政下,力行郡县国制,摆脱长期以来以血统而分割王权的历史流弊;确立天下国土、臣民、吏治莫不由王命出的强力制度。但或许这种制度在讲究血统亲疏的秦汉时代,并未被人们普遍接受,因此大秦实行郡县、一统天下之后,因暴政重刑而顷刻崩溃。至此高祖刘邦即认为此乃未行分封之故。因此其大行御封异姓、同姓王侯,以图封邦建国,完善行政。这种废秦制,用周制的结果造成了随后的削藩、推恩等中央与地方间的权力博弈。

大汉王朝确实在如何设置国家行政制度的道路上,经历不少的曲折。





除此之外,随着大汉王朝的戍边国境、开发边疆、驭控西域等政策的推进,大汉的国家行政制度逐渐依靠国力施行于更广阔的国土空间。行政制度的完备,对于科学合理地匹配中央权力的分割体系,以及有效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权责关系,起到了权力的制衡与保障之功,由此在我们今天寻求强国之路时,也应科学地结合现实的国情,在联系历史传统中确立当今中国的权力架构,进而保证权力这把双刃剑不致钝化或变质、失调。

4. 连线西域, 经营四夷 西域在春秋战国之际,并未表现出其对于中原政治的影响。当时的人们仅对于来自“西部”虎狼之国“西秦”有着恐惧之心。这种恐惧随着秦皇一统天下也就随之湮灭。但这并不表明“中原”的西北角即已无忧,兴起于大漠草原的匈奴却时刻威胁着秦皇政权,因此他筑墙戍兵、以守为上,终成长城之举。

历史进入大汉时期,高祖的平城之战、汉室的和亲之策、武帝的出兵征战,只换得随后的叛臣不止,国患并未根除,由此也促使一直关注中原的政治家们将视线投入到西北之地,充分认识到此地对于中华民族的安危之功。可以说,大汉王朝收服西域、建政西域,将西域纳入中原政治地理的伟大之举,具有绝对的战略眼光。因为随后的历史证明:西北与东南的得失与否,一直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存,而西北的战略意义则一直伴随着每个王朝的兴衰。时至今日,西北地区仍是中华民族的战略生命线。所以今日回顾汉史,对于大汉连线西域,经营四夷的战略举措,必须给予高度评价,大汉为整个中华民族敲响了警钟,西北安危,边疆治理,直接决定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

5. 开土拓疆, 融扩华夏 传统的中国政治观念里,对于国土的概念则一直奉行着中原汉文明。农耕政治的原则:固守中原,适当扩张,以守为主。因此,历史上,无论商周之战,还是春秋战国争雄,他们所追求的仅仅是谁问鼎皇权,一统天下,而并非是一种对外征服之战,也就是说:中国历史中的绝大多数的战争,均是内战或守土之战,这可谓是中华民族战争观

的独特之所在。回顾大汉王朝的开土拓疆史,也多是为了维护自身安全利益而行的惩罚之战,仅在收复失地、固土安疆。不过,大汉这种固土安疆的政治举措以及创立的一统政治思想,确实对于融合中华各族、建构整体民族共同文明传统,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文明,是随着领土的扩张而展开的。

6. 儒学一统,政治一制 一统天下,有两种选择:一为文治,一为武攻(当然也有着第三条路线:文治武攻)。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华民族的每一个王朝,奉行的都是第三条路线,只是文治与武攻各自所占的比重不同而已。不过由于深受周礼的影响,加上中国政治史中占据主体的汉民族长期身处农耕文明的地理环境,使其喜文好静,由此而影响到文治在中国政治的整体史中实为主角。所以按照此道,历代的帝王多数都会力求寻找到一种“以柔克刚”、可以从“治心”的角度驭控江山社稷的“文治之道”。在这一点上,大汉借鉴大秦速亡的教训而初行黄老,中行推恩,后行儒学一统为帝国正统政治思想的治国安民战略,无不是“文治治心”思想的集中体现。而这种寻找到的“儒学一统,政治一制”,也为后来者的政权王治进行了初始的塑形与定位,由此可见大汉政治制度实在高明。

7. 和亲休战,边疆亲和 历史进入大秦时期,由于长期的中原春秋争霸、战国之乱,人们将视角仅仅放在中原一江河之间;而对于广大的北部大漠却以冷眼相对。视线的冷漠,终于给予了身处茫茫草原上的游牧部族繁荣与壮大的机会。因此,当秦皇一统中原、问政九鼎之时,忽然奇怪地惊觉:自己的榻前已有“猛虎”安睡。从此“这条猛虎”即时刻冲击着中原的权力安危及民生祸福,绵延达 500 多年,几乎伴随了秦汉两朝生死全程。面对此情形,大汉王朝被逼战和相用,以求赢得战略增长期。但历史的结局证明:和亲、征战都未能在真正意义上降服边境匈奴,只有将她彻底同化,才是根本长久之策。但历史并未给予这样的机会,匈奴终于在“政治流浪”中永远地去了。



对于大汉“以和亲、图休战”的政策，后来者对此颇有非议，毕竟通过女人的肉体而换得皇权安稳，确实有失民族的尊严。但如若能够避免战火纷飞、生灵涂炭，是否也有一定的作用？民族的生存是根本，只要能够求得强盛的历史砝码——“时间与国力”，那么洗雪耻辱的机会是绝对有的。历史毕竟是奉行“谁笑在最后，谁才是真英雄”的逻辑的。当然，如果仅以此句为安慰，而大行“懦弱无能、腐化堕落”之政，那么这样的历史逻辑，只能是一种“阿 Q”精神罢了。

8. 国策定调，文治武功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治国安民历来有三种策略：单纯文治、单纯武攻、文武并用。但从历史的实际情形来看，前两种均十分稀少，文武相用才是主流角色。当然，这种治国安民的战略起源甚早，在传说的禹夏时代即已形成。相对于历史传说中，纯以文治、以德服人的三皇五帝时代，远古的政治制度只能仅仅作为一种动人的童话去诵读、怀想。一旦面对现实，则必须附加以必要的武力之道。

文治的历史从未在中国历史中消失，而真正将文治正式定位为国策的，则为周公时代。其借鉴“商之无道，事武血”，而代之“以文道，事柔”，无疑是一种争得民心的战略手段，并进而成国制。于是，同样借鉴了“前朝武力执政而暴亡”的大汉王朝——历经马上打天下马下治天下的过程，自然懂得文治武攻的各自作用，但过刚则易折，因此大汉王朝从其整体“安内理政”的政治风格来看，是以文治为主的。尤其是武帝时的独尊儒学，更加抬高了文治的必要性，并增加了其系统性。至此，文治武攻在大汉的政治生活中已经成为国策定调，并且各有分工：文治求长远，武攻卫安危。

9. 史学绝唱，哲学飙升 大汉王朝不仅政治、经济了得，其文化，尤其是史学、哲学与政治思想也非同小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大汉王朝不仅创造了以经济、国防为后盾的国家硬实力，更在诸如国家文化、民族思想、社会政治制度等方面，创造了光耀千秋的软实力。只有软硬兼施，才适合文治武攻的现实政治之需；只有软硬兼强，才可称得上为真正的大国强